

# 白修德：见证和记录中国抗战的美国记者

□ 荆晓燕



白修德（1915—1986年），本名西奥多·哈罗德·怀特，美国犹太裔记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时代》周刊驻中国特约记者，采写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报道，曾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白修德是中国抗战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1946年，他和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反映抗战时期较为真实的中国，轰动一时。斯诺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具备了真正的宽度和深度”；索尔兹伯里盛赞它“可与斯诺的著作相媲美”。书中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认为通往中国未来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 感性的认识：共产党是民心所向

白修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第一位学生，毕业论文题目是“1915年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以专业最优成绩毕业。面临职业选择时，导师费正清建议他走埃德加·斯诺的道路，于是，白修德决定将中国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站。1938年，白修德来到上海，次年春到达重庆，成为国民党政府中央宣传部的一名顾问。几个月后，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时代》周刊的特约记者。初到重庆时，白修德非常兴奋，因为他发现蒋介石政府高官中有许多人都有哈佛大学的教育背景。但是慢慢地，他失望地意识到“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因此根本无法帮助我了解中国真正的现状”。

1939年9月，白修德决定亲自到北方去调查战事。这次深入战争前线的经历，一方面让他对日军的暴行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他

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曾跟随国民党的军队驻扎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中，副队长在向村民请求物资补给时自称是共产党的游击队。白修德好奇地问为什么要这样说，结果副队长回答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游击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匹提供食物和水了。”这段旅途中的小插曲在白修德的心中萦绕，久久不散，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人民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如此不同。在此期间，他曾和共产党的游击队有过几天的接触，对共产党的主张、作风有了初步的了解。经过不断观察，他慢慢领悟到“先有人民，才有政府，你才能保护人民免受任何暴力与杀戮的伤害，他们才会满怀感激地接纳你……在山西的山区中，在那里，共产党人还没有自称政府，但他们正在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因为他们在保护人民”。山西之行，让白修德发生了认识上的初步转变：“在返回重庆时，我已无法再将蒋介石或他的美国化的政府领导班子当作真正的政府看待了。他们对各种事件毫无掌控力，我迫切地想要与他们相脱离。”

## 深入的观察：国共两党区别所在

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中，白修德曾经有过立场选择的困惑。一度，他与《时代》周刊一起把蒋介石包装成“民族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局面。但是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后，白修德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彻底的转变。河南大饥荒是现代史中最严重的饥荒之一，是一场生灵涂炭的浩劫。1943年2月末，白修德与《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深入灾区调查，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惨状。同时，他也发现这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更多是人祸。接连而至的旱灾、蝗灾固然是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强征军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灾荒发生后，各级官员瞒报，并对有限的赈灾款项进行层层盘剥，视灾区百姓生命如草芥。白修德将灾区的真实情况在《时代》周刊

曝光，这激怒了正在访美的宋美龄，并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白修德才得以面见蒋介石，讲述灾区的惨状，为灾民争取到了一定的救助物资。这次经历让白修德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他坦言自己的看法转变：“一开始是尊敬和钦佩，然后是同情和怜悯，最后是鄙视和不屑。”

大时代的风云际会，让白修德有机会与诸多伟人近距离接触。在重庆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龚澎等共产党人，并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1944年10月，白修德跟随美国特使赫尔利的代表团访问延安，作为唯一的美国记者在那里逗留三周，有机会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彭真等重要领导人。在他看来，延安的氛围和重庆明显不同：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城墙内弥漫着浑浑噩噩，时间停滞般的空气”；而延安“那里的空气和重庆不同，夏天干燥而焕发，冬天严寒而愉快”。通过这一阶段的接触，白修德对延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意识到“延安首先是个思想工厂”，“延安根据地并不往前线运输任何东西，一切战区都是自给自足的，延安唯一向外输送的是人——可以传播思想的‘党政干部’”。穿梭于重庆与延安之间，两相对照，白修德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迄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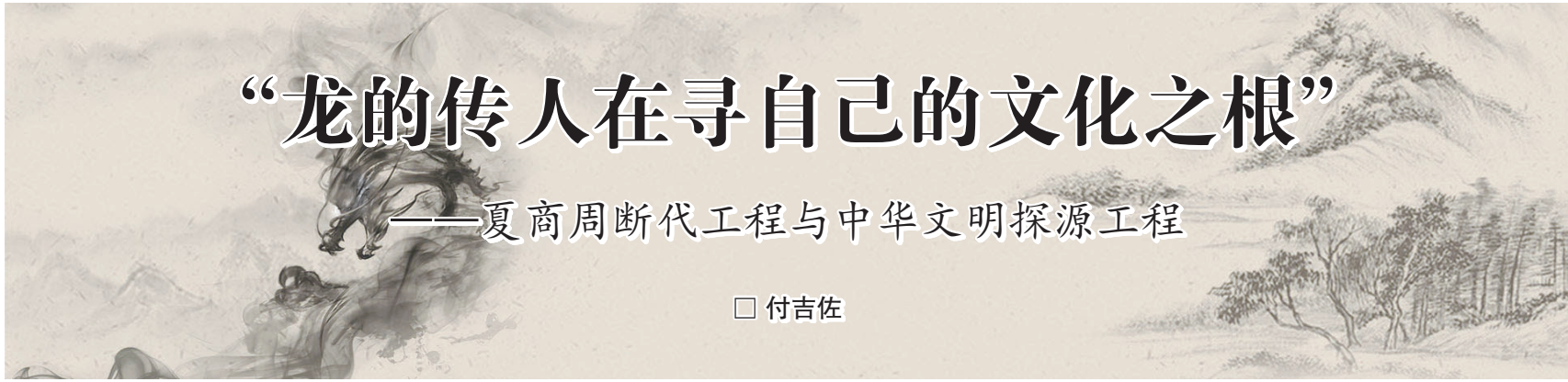
## 理性的思索：共产党的为民情怀

经过不断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白修德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不愿意因为服从美国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歪曲历史真相，他满足于碎片化地记录时代，更希望能整体性地呈现历史，并追寻历史背后的深刻逻辑。因而，当日本投降后，《时代》周刊要求白修德继续写文章美化蒋介石时，他选择

了断然拒绝。1945年9月18日，白修德告别重庆，返回美国。“在那一刻，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我下定决心，要成为第一个将蒋介石政权势必会土崩瓦解的故事讲出来的人——哪怕这意味着与《时代》和亨利·卢斯的彻底决裂。”

作为一个亲历中国激荡岁月的记者，白修德通过与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将对抗战大背景下的国共两党的观察和思索展现了出来。两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待人民的态度。在河南惨绝人寰的灾荒面前，国民党政府漠视生命，救灾不力；在日本罄竹难书的暴行面前，蒋介石却说“日本的侵略是癰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但与此相反，“人民”二字对于共产党来说却力重千钧，共产党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群众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面对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中国共产党“从不毛的山地伸出了一根基地的链环，以一个弧形的姿态，从东北一直连到了长江流域……他们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共产党并不曾使用什么魔术，他们只不过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变，而他们拥护这些改变”。白修德和贾安娜洞悉了共产党的力量之源，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基于这样的逻辑，他们在层层迷雾中洞悉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该书中大胆作出预测，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白修德亲赴前线报道、深入灾区调查，体现了一个战地记者的勇敢品性和悲悯情怀；为了戳破虚幻的泡沫，揭露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真相，他不惜与《时代》周刊决裂，体现了追寻真相的坚韧意志和不畏强权的正直品格；他通过《中国的惊雷》深入分析共产党的力量之源，预言胜利将属于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在层层迷雾中洞悉真相的能力，成为那段风云激荡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 付吉佐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发展史，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如何起源、何时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等问题，其实并不十分清楚。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如仰韶晚期、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遗迹和二里头夏代文化的重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如现代物理学、天文学、计算机等相结合运用于考古，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物质和技术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厘清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学界相继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但要开展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对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进行完善。因为只有三代界限清晰，才能由近及远开展上溯式研究。因此，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前，首先开启实施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三代的相关记录，频见于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但三代的明确纪年最早却只能上溯至“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尽管自西汉刘歆开始，几千年来众多学者都试图推定共和元年以前的年代。但由于学者们“各自为战”，加上资料有限、技术不发达，

所以一直没有突破。而且由于缺乏考古遗存的佐证，有学者甚至认为“春秋以前无信史”。

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及几十年的发掘研究，“新的考古资料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历史有了一个轮廓性的记录”。因此，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设定了四个目标：其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从周武王到周厉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二，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帝辛，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从商汤到小乙，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其四，对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自启动以来，这项“史无前例的宏大学术工程”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感慨地说，“龙的传人在寻自己的文化之根”。与此同时，国外学术界也非常关心，美国的《中国古代通讯》作为欧美国家研究中国古代的最主要期刊，对这一工程作了详细报道；还有些外国学者寄来关于武王克商年代研究的新成果供我国有关专家参考等。

经过200余位多学科专家历时5年的联合攻关，2000年工程结项。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这份年表把我国有科学依据的历史纪年由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工程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

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这些作为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批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文明编年史打下了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经过两年（2002—2003年）的预研究，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2004年正式启动。第一阶段（2004—2005年）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原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文明形态开展研究；第二阶段（2006—2008年）的研究上限向前延伸至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起步更早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第三阶段（2006—2015年）重点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开展工作。2016年整体工程完成结项，考古调查及发掘实例说明，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

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也即是说，自1996年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至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工程完成结项，经过20年的研究，中国人终于对自己民族五千年的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有了科学的答案认知——即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成长起来的，并呈现出多元多点出现、最后融汇为“一体”的发展特点。

20世纪90年代开始酝酿、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上，工程研究团队累计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和出版数十部学术专著，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并探索出一条多学科联合研究的道路。在社会上，最新研究成果呈现于新修订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利于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国际上，不仅可以对中国的文明古国形象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说明，而且可以为有关人类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技术、方法参考。



2022年11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时指出，坦赞铁路是中坦和中非友谊的丰碑。当年中国自己还很贫困时，我们勒紧裤带帮助非洲兄弟修建了坦赞铁路。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更要本着真实亲诚理念，帮助非洲朋友实现共同发展，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坦赞铁路是连接中、南、东非交通的大动脉，也是连接坦、赞两国的主要交通干线。坦赞铁路的建成促进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从经济上摆脱了殖民主义控制，有力支持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架起了中非友谊的桥梁，密切了我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 （一）

近代殖民统治时期，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的经济受殖民当局的控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独立之初的坦桑尼亚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处于从属地位，是一个出口原料、进口成品的农业国。随着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坦桑尼亚与赞比亚分别在1961年和1964年相继宣布独立，这时的非洲大陆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者与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较量，赞比亚一时间成为支援南部非洲人民解放斗争的前哨。赞比亚以蕴藏丰富的铜矿而闻名，铜矿贸易是其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但赞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家，东西南三面都是未独立的殖民地，殖民者控制着出海口，切断了铜矿贸易的线路，只能通过东北方向的坦桑尼亚出口铜矿。为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决定建设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打通出海口。但是新成立的两个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无力自行筹建大型工程，只能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求助于西方国家。世界银行对两国是否有能力建成这样一条铁路持怀疑态度，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西方国家也从自身利益考量，认为修建坦赞铁路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援建坦赞铁路的请求采取拒斥态度。坦、赞两国转而求助苏联政府，也同样遭到拒绝。在四处求援无果的情况下，坦、赞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中国。

## （二）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在同中方领导人会谈时，表达了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愿望。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内经济仍很困难。令他意外的是，中国领导人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中国政府从支持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积极发展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角度，表示同意援建这条铁路。中方将援助非洲当作应尽的国际义务，不求回报。1963年，在同非洲朋友谈话时，毛泽东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期间，再次探询中国对修建坦赞铁路的意见。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只要坦、赞两国下定决心，中方愿意承担投资修建坦赞铁路，并强调这是对广大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地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支持，帮助支持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维护民族独立。1967年9月，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署协定，修建坦赞铁路正式确定。

## （三）

援建项目确定后，中国政府迅速派出了勘测设计人员。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1860公里，由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勘测、设计、组织施工。虽然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早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非洲后发现当地的施工条件艰苦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铁路沿线地形复杂，线路需跨越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非洲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人迹罕至，到处充满了野兽、蚊虫和病菌，被人们称为“绿色沙漠”。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

# 坦赞铁路见证中非友谊

□ 李萍

常艰难。在炎热的非洲南部地区，大多是河流与沼泽地，地形特殊，经常暴雨倾泻，施工便道被冲毁。由于施工条件艰苦，大型施工机械极度缺乏，工程建设大部分时间只能依靠人海战术。

在野外施工，工作现场就是生活现场，工作条件艰苦，生活也是超乎想象的艰苦。国内运去的帐篷不够用，施工人员只能住在自己搭建的草棚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工人们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将铁路工程建设一点点地向前推进。中国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感动了坦、赞两国施工人员，他们也向中国工人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同努力推进施工进度。经过全体工程技术人员

的共同努力，1976年7月14日，这条曾被西方舆论断言不可能建成的铁路比预期时间提前建成通车。

## （四）

坦赞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巨大努力，全线修建桥梁320座、隧道22座，兴建车站93个，建设房屋37.6万平方米。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6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多达1.6万人，投入物资机械83万吨，先后累计派出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次，参与当地工程建设、管理、维修、培训等。作为当时并不富裕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帮助坦、赞两国修建铁路。

坦赞铁路建成后，为赞比亚矿产物资出口提供了一条新的、可靠的出海通道，有力支援了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铁路沿线建起了许多新兴城镇，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支援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无私援助赢得了非洲人民的真诚友谊，非洲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给予有力支持，帮助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位。坦赞铁路见证了中非人民之间的患难友谊，是用汗水和生命铸就的友谊之路。尼雷尔曾高度评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卡翁达总统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铁路被誉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

